



SHIXUE SHIGUAN SHIMEI

诗学·诗观·诗美

陈良运 / 著

① 江西高校出版社



● 陈良运著

诗学·诗观·诗美

● 江西高校出版社

诗学·诗观·诗美

陈良运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北京西路77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文化用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875 插页4 字数323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1033-079-9/1·7

定价：5.95元

内 容 简 介

《诗学·诗观·诗美》分“诗学范畴”、“文学观念”和“美学流变”三个专题，探索了中国诗歌艺术发展的源流演变，揭示了“言志”、“缘情”、“意象”、“意境”、“诗而入神”等诗美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丰富的内涵，阐明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美学意义是怎样向现、当代新诗艺术渗透和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的。诸如“意象”、“境界”等诗学观念的原型为著者首次发现和提出，引起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注意，有重大学术价值。陈良运的诗论文章已形成他独特的风格，行文流畅，绝不故作高深，努力追求“诗学论文也有象诗一样的境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陈良运，江西萍乡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江西分会常务理事，江西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诗学方向研究生导师。主要著述有《新诗艺术论集》、《新诗的哲学与美学》、《文与质·艺与道》、《中国诗学体系论》、《诗学·诗观·诗美》等。已编集、完成即将付排的书稿有《论新诗的审美境界》、《〈周易〉与中国文学》。

目 录

自序：诗学研究感言	〔 1 〕
-----------	-------

诗学范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轮廓	〔 9 〕
“诗言志”新辨	〔 29 〕
“诗缘情”诗学意义新识	〔 44 〕
意象、形象比较说	〔 60 〕
意象、意境异同论	〔 76 〕
中西意象流变探	〔 88 〕
“意境”新释	〔 102 〕
试说“情境”	〔 119 〕
“境界”溯源新得	〔 133 〕
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	〔 148 〕

文学观念

宏观·共时·文学观念	〔 175 〕
------------	---------

古代文学观念起源试探	〔 183 〕
《周易》的符号象征	〔 201 〕
说“意”	〔 216 〕
品“神”	〔 240 〕
“言不尽意”及其它	〔 254 〕
情·理·正·变	〔 270 〕
文学理论的自觉时代	〔 286 〕

美学流变

古代文论的当代接受	〔 303 〕
“主题思想”异议	〔 318 〕
“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之重整与更新	〔 335 〕
文体变革随想	〔 349 〕
两种诗歌观念与两种价值取向	〔 361 〕
毛泽东诗词的意象化境界	〔 374 〕
回归诗学本体的杜诗观照	〔 382 〕
接受美学与《凉州词》	〔 390 〕
古代诗词“异文”的审美判断	〔 400 〕

后 记	〔 407 〕
-----	---------

自序：诗学研究感言

I 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生浓厚兴趣，始于我的大学生活最后两年，当时正恋写新诗，已在《人民文学》、《星火》等刊物发表一些作品，为了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便在课余时间钻研一些诗歌理论。有感于当时的新诗理论尚为薄弱，转而搜求一些古代诗歌论著。学校图书馆凡是能让学生借阅的此类书籍，都被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一过；为一部本校找不到的《清诗话》，向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胡守仁先生求助，守仁先生从江西省图书馆为我借来了全套线装本《清诗话》，我如获至宝，以三、五天一册的速度品读并摘录了大量卡片。三年级的学年论文《论姜夔的〈白石诗说〉》，是我第一篇研究古代诗学的习作，指导教师黎仲明先生审读之后，写了颇有褒奖的评语并给了高分，使我倍受鼓舞。此后更是每天不停地搜寻，卡片越积越多，连诗也写得少了。同室一位好友劝道：“你写新诗已见前途，何必回头弄这些古董？……”我答曰：“将来写不了诗的时候，或许有些用处。”

不料此话后来果然应验，毕业不久即遇“社教”，接着又卷入十年“文革”，十多年里，当教师不象教师，当干部不象干部，“诗人”之“冠”先如戴罪的荆冠（为百余首诗忍受了百多天的审查），后来便不翼而飞了。实际上，我也基本上停止了写

诗，因为对于那些“新诗要向样板戏学习”的高论实在不敢苟同，只是常在避人之处、掩门之后，无声地诵读一些古典诗词和外国诗歌名作，翻阅劫中幸存的诗学卡片，为的是使自己不至忘了什么是诗。漫长而恐怖的“文革”终于结束，在一些老朋友、老编辑的鼓励下重新拿起诗笔，可能是由于人到中年，世事多磨，思想沉静了一些，写诗的激情爆发渐渐少于理性的思考；与此同时，又注意到那些“拨乱反正”的新诗评论，觉得其政治性的批判重于诗学理论的思辨，无助于新诗回归本体和正道。为什么我不能写点诗评、诗论文章？于是便着手论说新诗。

多变的生存环境与自身容易激动的生理素质，再是由于没有从名师接受专业导向较为严格的研究生教育，我读书做学问都有点“打游击”的作风和“机会主义”的习气，以至获得什么样的机遇便向那机遇的方向投入。由青至壮的二十五年间，有幸在三个国家级的大刊物上三次发表头条文章，由此使我三折其向：第一次是《人民文学》1960年某期发表诗作《安源工人的怀念》，使我很写了几年新诗；第二次是《文艺报》1981年某期发表诗评《试论艾青的艺术风格》，使我基本确定了向理论领域的转移；第三次是《文学遗产》1985年某期发表古代诗学论文《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此后古代诗学的研究便几乎成了我的主业。如此三变其途，使其望我在新诗领域有所建树的朋友们十分惋惜，我只得宽解地说：转来变去总是以诗为轴嘛！

的确，从总角少年伊始，我就特别喜欢诗，珍爱诗，一见到诗身心就特别舒畅，情思飞扬，诗与春天原野上生命的绿色，是我审美内视与外观的快感之源。我妻赖施娟女士说：“你每篇文章的题目都有‘诗’字！”或许，说每篇文章都离不开诗、都谈了诗更正确一些，所以这本论文集的书名，又连用了三个“诗”字。

II 我很崇敬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先生，崇敬之情的发生不仅

仅是他们的“拍案而起”和不食美国面粉，更多是从做学问的角度：他们既研究今人也研究古人，既写新诗又投身“故纸堆中”去“弄个明白”，在古今诗学领域里都颇多建树，成果辉煌。如今须知古，知古是为了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地知今，为此，进入中年后的我，便很执着地学习闻、朱两位先生做学问的方法，试图沿着他们的路子走，当然也清楚地意识到，我攀登不上他们已经达到的学术高峰，进入不了他们左右逢源的学术境界，首先是我幼时没有家学渊源，后来所受中西教育的程度又远不如他们的完善与深湛，且在四十五岁以前尚未置身于一个起码象样的学术环境。……尽管客观、主观的条件种种不及，我的心与闻、朱二位先生却是相通的，那就是都钟情于诗，都珍视祖国丰厚的诗学遗产，都希望将古代诗学清理出一个头绪来，以有助于现代新诗之学的建立和发展。闻、朱二位先生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稚童般的后学该如何进入角色呢？

我也有幸运之处：从七十年代末起就苦苦思索古代诗学有无一个理论体系，四年后将思索的结果写成那篇《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一个轮廓》，怀着孤注一掷的心情投给《文学遗产》。当时我是一个地方文联的工作人员，毫无学术身份，想不到一个很权威的学术刊物竟很快地、破格地接纳了它。当我接到发表拙文的刊物，象被注了一针强力的兴奋剂！这一年里，我正被人扶着、推着走上仕途，小小纱帽一顶接一顶飞来，在他人眼中是一生难逢的“良”运莅临，我却手持该期刊物，以献身学术明志，毅然向本市党的最高负责人要求摘帽他往。几经周折，终于调回了离别二十二年的母校——江西师范大学，从此得以身无牵挂地专门从事久已向往的研究工作。有了《轮廓》一文作纲要，心中的大目标是弄出一部有关中国诗学体系的东西来。这是一个大工程，一场攻坚战，需要从深入的局部研究开始，先来几个回合的外围战。于是，我将《轮廓》中提出的“志”、“情”、“形”、

“境”、“神”五大诗学观念及其它一些有关问题，一个个拈出来另做文章，陆续写了三十来篇长论短说，这些文章在全国各地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之后，不少幸有反响。

或许因此，三年后我又有了一次幸运：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与上海社科院文研所共同承担一个国家社科“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宏观研究”，项目主持人之一、上海社科院文研所所长陈伯海先生，命我报一选题。多年夙愿实现有望，我毫不犹豫地呈上《中国诗学体系论》的写作计划，经会请专家论证，选题顺利通过。1989，是我苦战的一年，三十余万言的书稿于年底誊毕送审。现在，当我凝视那半尺厚的手稿时，对于打外国战时的那些战果倍增深情，它们象一级又一级的台阶，把我推上了《中国诗学体系论》。进入本书《诗学范畴》和《文学观念》两辑的十八篇文章，读者如有兴趣，将可与彼书参读，它们是我在中国诗学研究的路上浅浅深深的一串脚印。

Ⅲ 笃实、准确的资料与独立自主的思考结合，这对做点学问的人来说，可能就是所谓主、客体的统一。自我意识比较强烈，直觉思维尚为发达，或许是我在青少年时期诗歌创作实践中养练成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这一治学方法，我不敢附和某些批评家责其“大谬不然”。为建构某个理论的设想，广求各种资料以确证这一设想的可能性与正确性，正如建筑师先有蓝图再选择各种建筑材料付诸施工，其“谬”何在？如果其资料达不到“求证”的要求，“假设”自然要撤消，以伪证坚持其“假设”，那就令人嗤之以鼻了。“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语，《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在我不算长也不很正规的学术生涯中，的确有过多次这样的幸会：对某些论著的原始文本反复研读、对大量有关资料冥搜苦思之后，会有豁然贯通的心理状态

发生，脑海里清晰地涌出要表述的东西，一切材料好象在自动地进行筛选和组合，这时秉笔直书，一篇文章往往能一气呵成。我向往诗学论文也有象诗一样的境界，但又尽量把话说的明白一些，结论作得更确切一些，不象“朦胧”诗那样境界幽深莫测，意义不可确指，尤不故弄玄虚。

在多数拙文中，自认为有些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纯属本人的心得见解，而遗憾的是少了些人所未见的独家资料，因为现在我所处的学术环境，不能给我提供什么珍籍秘本，前辈如郭绍虞等老先生，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我受惠于他们，内心常怀感激之情。不过也有拙文两篇使我有些得意，那就是从到处都能见到的《淮南子》和《论衡》两部书中，发现了前辈学者尚未提及的“境”和“意象”的原始资料。二者的发现，将学术界沿用的成说，上推了数百年，在《意象、形象比较说》和《“境界”溯源新得》两文中陈述的便是这两个“发现”。较之擅长考证，时有新材料贡献于世的学者，我不过是瞎猫碰见了死耗子。不过，这两个小小的“发现”，使我对两个诗学观念范畴研究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进展。设想，如果多一点这样的新资料发现，诗学的研究肯定会扎实些，今后，朝这方面多多作些努力吧。

Ⅳ 研究中国古代诗学是为了丰富和发展当今中国的新诗之学，至今我未改初衷，撰写研究古代诗学的文章，都力图与当代发展中的文学艺术新观点相沟通，或以其为参照，在不违背、不篡改古人文本原意的前提下，作出对今人有所启发，有所效用的理论阐释，在一定的程度上、一定的范围内做到古为今用。在撰写研究当代文学、诗学的理论文章或评论新诗时，则以与所论对象可以进行联系或类比的历史经验为参照，适当化入古代文论、诗论中的某些精采的论述，试图使这些文章在理论上增加一点纵深度，同时显示一点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风采。本书《美学流变》

九篇文章，是我从理论、从作品分析的角度力图实现古今互渗的尝试之作；那些化入古代诗学精采观点观照和论述当今新诗的文章，则多数收在《新诗艺术论集》、《新诗的哲学与美学》和即将出版的《论新诗的审美境界》三个专集之中，本书只选《两种诗歌观念与两种价值取向》一文作为代表。

走沟通古今的治学道路，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当代中国进入新的时期以后的新文化，或许有所裨益，只是本人才疏学浅，时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已到“知天命”之年，知识结构和思维指向都已基本定型，在今后能继续工作的岁月，大概再不会改途易辙了。忆起十年前，曾写过一首用以自警的诗：“你并没有多大的能耐／何必翘起尾巴当旗杆／在你的年纪，普希金死了／留下一座辉煌的诗的宫殿！……”在我今天这个年纪，闻一多先生饮弹牺牲已两年有多，朱自清先生再过一年亦将辞世，我能不能再贡献出一点更为精当的东西，以不辜负比闻、朱二位先生多活的那些年月呢？

1990年11月29日于江西师大南院

● 诗 学 范 畴 ●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有丰富多彩的诗歌，也有丰富精深的诗歌理论，诗歌理论伴随诗歌创作发展而发展。历代的诗歌理论家，对于历代诗歌种种审美特征有过很多的论述，既深且广地评述了种种诗歌现象，品评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对于诗歌创作发展的轨迹（尤其是诗体变迁的轨迹）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对于诗歌理论本身是如何发展的，它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想是怎样积聚和升华的……，这一切，还没有一位理论家作过较为明确的阐述。

历览前朝后代的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概念，这就是：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我们追踪一下这五个重要的审美概念的来龙去脉，探索一下它们丰富的内涵，理清一下它们相互间内在和外在的联系，就会进一步发现：中国自有诗以来，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实践的抽象表述是：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这是否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美学结构？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发端于“志”

“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尚书》的可靠性后人有所怀疑（其声律之说可能是汉朝学者附会的），但“言志”之说并非《尚书》独出，在秦汉以前其他人的著作和言论中已经多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的话；《礼记·仲尼闲居》记录了孔子说的“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孟子·万章上》记录孟子的话也是言诗及志：“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儒家学派之外，庄周云：“诗以道志”（《庄子·天下》）；荀况云：“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可见“诗言志”不是一家之言，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谈到诗的时候，所使用的共同语言。

我们的先人赋予“志”的内涵是什么？

首先要从他们对待诗的态度来考察。远古时代，人们尚未自觉地意识到诗是一种艺术样式，表达感情的美文学，而只是把诗当成一种特殊的言论方式。从《尚书》记载舜对夔所说的话可以看出，“言志”是要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教化目的。到了孔子时代，孔子将这一目的定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还赋予诗多种工具作用，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可以助言；可以“授之以政”和从事外交活动，总之，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服务。

由于对待诗的实用主义态度，古人所言之志是简单而很切实用的。志，蕴蓄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马克思指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处于对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①考察先民的诗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言之“志”也就是言身边之事，所